

研讨实录

第 114 期

114

张宇燕：访美归来，谈中美关系

项亦男：中美贸易摩擦下的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启示与思考

崔凡：中美经贸关系与 WTO 的未来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Shanghai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868号办公A楼802室 Address: Rm 802, Office Building A, 868 Longhua East Road, Shanghai, China
邮编：200023 ZipCode: 200023
电话：86-21-62188752 Tel: 86-21-62188752
传真：86-21-62188714 Fax: 86-21-62188714
网址：www.sdrf.org.cn WebSite: www.sdrf.org.cn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编
二〇一九年一月

序 言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于 1993 年成立，以积极推进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事业为宗旨；以募集、运作资金，研究、交流、资助、奖励有关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项目为业务范围。

2005 年以来，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在业务开展方面进行了更多有益探索，推出了每月的“上海发展沙龙”主题活动，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合作，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和实业界人士进行演讲，与听众进行交流。时至今日，沙龙已经成为了基金会有一个品牌。

从 2007 年开始，基金会在每年的年中举办“世界和中国经济论坛”，重点分析全球经济对中国的影响；在每年的年末举办“中国经济论坛”，着重分析当年的经济形势，展望来年的经济走势。

2009 年和 2010 年，基金会又分别召开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国际研讨会，邀请了海内外著名学者、经济学家、投资者、金融和商界人士，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

基金会从 2009 年开始至今，与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合作，每年连续合办“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城市化”专题圆桌讨论会，针对城市化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基金会也将知名专家和基金会自身的部分研究成果编撰成书，“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丛书”已出版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新型城市化：抉择和路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再思考》、《名家谈中国经济未来》。

我们希望能够将有价值的见解与朋友们分享，因此把沙龙和研讨会的一些精彩内容陆续编辑成册，称为“研讨实录”，不定期的发行，旨在将这些活动的互动过程尽量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给我们提出更多更好的建议，以使基金会能够更上层楼！

是为序。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会会长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胡成彰' (Hu Chengzhang), the Chairman of the Shanghai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Board of Directors.

编者的话

本期《研讨实录》收录了最近三次学术活动的实录，即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举办的三期沙龙：第 143 期沙龙——张宇燕先生的演讲“访美归来，谈中美关系”，第 144 期沙龙——项亦男女士的演讲“中美贸易摩擦下的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启示与思考”；第 145 期沙龙——崔凡先生的演讲“中美经贸关系与 WTO 的未来”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先生在演讲中指出，特朗普对华政策博弈中正在逐渐成型。对我们来说，维持一个多边贸易体系是比较理想的。我们要进一步推动区域合作，可以考虑加大推进区域化合作力度，如加速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和 RCEP 谈判，甚至可以考虑启动加入 CPTPP 谈判。

上海科技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项亦男女士在演讲指出，中美贸易摩擦使得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在人才培养、技术升级、材料和设备稳定供应、终端产品销售等方面受到影响。我们可采取的应对措施有：（1）加大资金投入的力度。（2）加大自主研发的力度。提升国产替代率，给国产芯片及设备、材料以试错、提高的机会。（3）加大人才培

养的力度。(4) 加大国际合作的力度。集成电路产业链是国际性的，需要我们有国际的视野，取他人之所长，用好国际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在国际合作中，要提升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注重合规经营。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研究部主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崔凡先生在演讲中指出，关于中美贸易争端，可以用四句话作一个简单概括，这四句话要完整地放在一起：美方部分诉求情有可原，美方使用手段比较恶劣，中方实施反制迫不得已，中美长期合作非常必要。世贸组织历次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审议，包括 2010 年以前的历次过渡性审议，都对中国的履约情况作了肯定的评价。网上广泛流传的所谓中国没有履行承诺的 11 条都是似是而非的。我们强调中国遵守了现有规则，不是否认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面临当前复杂的国际经贸关系形势，我们应该坚持扩大开放与深化改革，并且积极推动世贸组织改革与新议题的谈判。

更为详细的精彩内容，请大家阅读本期《研讨实录》。

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二〇一九年一月三日

目 录

张宇燕：访美归来，谈中美关系	1
项亦男：中美贸易摩擦下的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启示与思考	5
崔凡：中美经贸关系与 WTO 的未来.....	26

访美归来，谈中美关系

张宇燕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上海发展沙龙第 143 期 2018 年 10 月 18 日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了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研究员。他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在中国社科院先后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从 2011 年开始，他兼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今年八九月份，他去了美国两次。最近大家比较关注中美关系。我们想请他从访问美国的所见所闻所思，跟我们讲一下中美经贸关系、中美全面的关系。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

张宇燕：谢谢乔依德先生。尊敬的胡会长，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很高兴也很荣幸，今天有机会到上海来，跟各位谈一谈中美关系。刚才我们已经聊了不少，听各位的讨论，我觉得其实可讲的东西也不多了，大家都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但是既然来了，我也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刚才乔依德先生讲到 8 月份 9 月份连续两个月去美国，接触了多方面的人士。从跟美方的交流来看，我有这么几点体会。

第一，特朗普对华政策博弈中正在逐渐成型

首先，美国对华态度，特别是对华认知，发生了较大变

化。当前，两党的精英层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如去年12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所公布，把中国看成竞争对手。这不仅仅是特朗普政府的看法，也包括企业界。美国商会明言，原来商会在中国有很大的利益，会主动为中国说话，今天的美国商会当然也能为中国说话，但是他们愿意和政府一致而承担一部分损失。这就和以前很不一样了。

第二，在国内问题上，美国分歧非常大，但特朗普政府在对外政策上有决定权。有人说，美国现在不是美利坚合众国，美国现在是美利坚分裂国。不同意见的人分歧非常大，甚至势不两立，反特朗普的力量也非常强大。但即使如此，贸易政策、对外政策的权力主要掌握在总统手里，他有30%-40%的坚定支持者，再加上美国宪法和法律赋予总统的权力，实际上保证了他在贸易政策、对外政策上的决策权。

第三，美国的对华政策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成型，是在不断摸索中往前走。特朗普并非一上台，就制定了一个全面对华战略。他先开始从贸易上入手，更像是一个博弈，我走一步，你走一步，我再走一步。在博弈中，我们看到他的对华政策开始逐渐成型。

第四，这次中美之间的对抗不仅仅是在贸易的领域，美国对华政策很可能是三重的：经贸 - 政治 - 安全。安全又和战略相联。经贸问题，总体来讲都好解决，但一旦涉及到政治问题和安全问题就复杂了。一位智库主任非常清楚地告知，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是长期的，而且难见底。

第五，特朗普本人在政府中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方方面面，左派右派，企业界都认为，尽管特朗普有很多的顾问，而且能够深深影响他，但是最终拿主意的还是他自己。所以

中美关系问题的解决，或者是突破性的解决，或者把势头遏制住，还是得看特朗普本人。

第六，美国还是有一些真正关心中美关系的人。有很多美国人还是非常诚恳地向我们提了一些意见和建议，说明还有做工作的空间，有一些人真心希望中美关系回到从前。

第二，维持一个多边贸易体系是比较理想的

我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感觉到中美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进入了质变期。今年夏天的时候，我们提出中美关系未来会有四种可能出现的情景。

第一种情景是“让利不让理”。美方提出的关于贸易的要求，我们可以做出一些让步，比如，我们可以多进口一些美国产口，市场开放的步伐和领域根据我们自己的节奏和目标加快、加大，这就是“让利”。但是我们要坚持 WTO 原则，维护国家利益，这就是“不让理”。中美贸易摩擦走到今天，看来这种情景实现的可能性已经不大。

第二种是参与多边机制谈判。在 WTO 规则里面，我们跟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谈判，可以想象那将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因为他们会提很多要求。如果谈到最后能够保住多边体系，把美国也“拉”回来，就是比较理想的。在此我多说两句。关于特朗普政府的经贸政策，一般人认为他要“退群”。我认为“退群”的说法有些道理，但是他真正想要的不是“退群”，而是想以退为进，确立新的规则，来约束其他国家，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

第三种情景是美国和欧洲、中国最终都没有谈成。那就有点“天下大乱”的味道了，在经贸领域你制裁我，我报复你，你再制裁，我再报复，各方就这么互相损害。现在看来

这种情景出现的可能性也不大。

第四种情景是发达国家谈成了，他们再拉着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新群”，把中国排斥在外。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但是这种苗头或多或少地出现了。

第三，进一步推动区域合作

从目前来看，我们要争取的是四种情景的第二种，即通过 WTO 的改革或使之现代化，来维持住多边贸易体系。第二种情景是最可行的，对我们损害相对也最小。实际上我们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措施与未来 WTO 的改革方向很多也是吻合的。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和欧盟成立 WTO 改革联合小组。这里我还建议，可否在金砖五国机制内成立一个 WTO 改革联合小组，为多边机制的现代化注入活力。

趋利避害是应对挑战的基本原则。具体说，我们可以进一步加强对“竞争中立”原则的研究，也可以考虑加大推进区域化合作力度，如加速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和 RCEP 谈判，甚至可以考虑启动加入 CPTPP 谈判等。当然，我们还要继续坚定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十几亿人口，中华民族的复兴，肯定会有磕磕绊绊。最关键的还是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继续坚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今天的中美经贸冲突，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一定能够跨过这道坎。展望未来，已经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住中华民族复兴的步伐了。

中美贸易摩擦下的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启示与思考

项亦男

上海科技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上海发展沙龙第 144 期 2018 年 11 月 27 日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各位来宾，我们的沙龙马上开始。我们很高兴地请到了今天的演讲嘉宾——项亦男女士，她是注册会计师，现任上海科技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长期从事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资，担任盛美半导体、杉德等多家公司的董事。为什么会请项女士来呢？几个月以前，我们参加一个研讨会，也是关于中美贸易等问题的讨论，她也做了一个发言，对我们国家半导体产业发表了看法。她提到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我在其他地方从来没有听到过，具体不说了，请她来讲吧。下面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项亦男女士。

项亦男（上海科技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大家晚上好。首先谢谢乔会长给我这样一个演讲的机会。大家对集成电路产业都非常的关心，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发生了中兴事件，10 月底又发生了晋华事件。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的确给我们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带来不利的影响。从产业的发展看，现在集成电路产业也逐步在往中国大陆转移，如何把握产业转移的机会，做好我们的中国“芯”，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今天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整个集成电路产业大致的情况，以及我对这个产业的体会

和一些想法。

大家现在都说集成电路非常重要，为什么讲它重要呢？还是从集成电路的应用来讲。我们用的手机、电脑、汽车，包括现在非常热的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都离不开芯片。以手机为例，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会用到手机当中的通讯芯片；我们一按手机就解锁了，用的是当中的指纹识别芯片；我们拍了非常多好看的照片，这当中会用到存储芯片。现在我们用手机拍一下，就知道面前的产品是什么价格，哪里可以买得到，这当中用的是人工智能芯片。手机中各项功能的实现，都是由芯片来提供支撑的。所以我们讲，集成电路是电子信息技术创新的基石。集成电路是微观世界的制造。在进博会的时候，我去参观了荷兰 ASML 公司的展台，他们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光刻机每次移动的距离是 2 个纳米。集成电路这个产业代表着当今世界微细制造的最高水平。它也关系到我们国防的安全，关系到网络的安全，关系到国家经济未来的发展。所以我们说，集成电路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产业。

什么是集成电路？我先介绍一下什么是半导体。半导体是常温下导电性能介于导体和绝缘体之间的一种材料，常见的半导体材料有硅、锗、砷化镓等。用这些半导体材料，可以做成集成电路，也可以做成集成电路之外的其他产品。集成电路是一种微型电子器件或部件，采用一定的工艺，把一个电路中所需的晶体管、电阻、电容和电感等元件及布线互连在一起，制作在一小块或几小块半导体晶片或介质基片上，然后封装在一个管壳内，成为具有所需电路功能的微型结构。这样形成的一个器件，能够根据我们的需要，实现存

储、计算等相关的功能。我们也会经常提到芯片，芯片其实不是一个学术上的定义，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芯片指的是集成电路。我今天提到的芯片，专指集成电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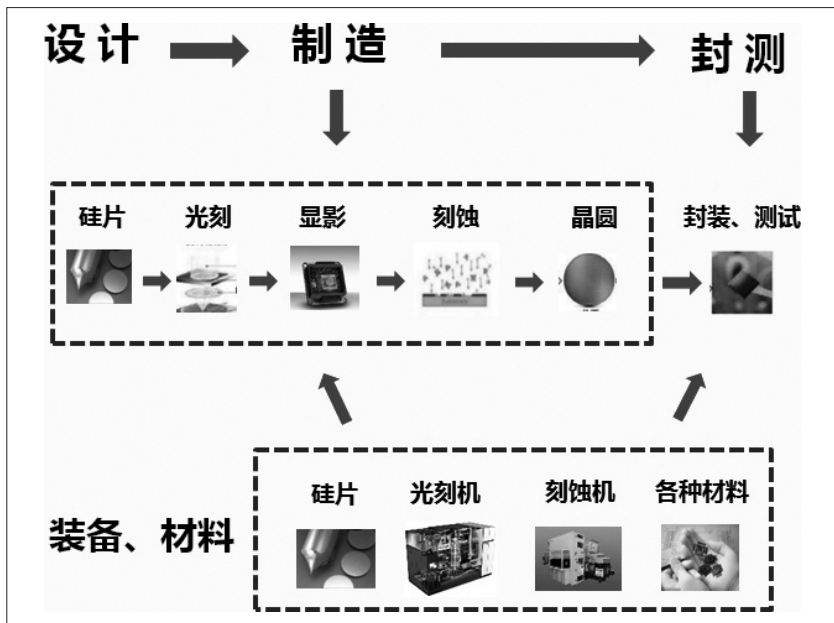


图 1：集成电路制作流程

我们来看一下，一颗芯片是如何产生的。芯片的制造通常会分为三个大的步骤。第一步是设计，就是要出图纸，把电路图设计出来。第二步是制造，就是把电路真实地做出来。制作集成电路用的最多的材料是硅。我们讲的硅片是圆形的、纯度非常高的硅的薄片。我们平时讲纯金，讲 24K 金，金的纯度是 99.99%，即 4 个 9。硅片的硅的纯度，要达到 9 到 11 个 9。在硅片上面，通过重复的光刻、显影、刻蚀等步骤，把电路一层一层做出来，现在最高大概能做到 60 几层。最终形成的产品，就是含有电路的硅片，我们

把它称作晶圆。一个晶圆上面可以有几百颗甚至上千颗的芯片。第三步是封测，就是把晶圆切割开来，把一颗一颗芯片独立出来，给芯片穿上衣服，起到保护的作用，把引脚拉出来，使芯片将来能够和其他器件连接。在制造和封测的过程中，会用到非常多的装备和材料。芯片制造必须用到的设备有光刻机、刻蚀机等。在一条生产线上，基本上会用到18大类的设备。我们平时经常听到7纳米的12寸线。这里的12寸是指晶圆的直径，8英寸约为200mm，12英寸约为300mm。7纳米是指线宽，即电路与电路间的距离。一般而言，晶圆直径越大，制造的难度越大；线宽越小，制造的难度越大。

在集成电路领域，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概念叫摩尔定律。摩尔定律是摩尔先生提出来的，是对芯片小型化趋势的一个预测。它指的是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大概每隔12个月到24个月，集成电路里面元器件的数目会增加一倍，性能也会提升一倍。我体会最深的是在大学的时候买电脑，那时候是台式机，电脑价格没隔多少时间就会下降，但电脑的性能会上升。这当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电脑中的芯片是按照摩尔定律的节奏不断往前走的。

我们通常会按照芯片制造的步骤，将产业链分为四个大的部分：设计、制造、封测（封装、测试）、装备和材料。

这个产业有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是资金密集。从产业链的四个部分来讲，资金需要最少的是设计端。最近我们投了一家设计公司，天使轮投资是3.5亿。制造端一般是整个产业链中需要资金最多的，我们投了中芯南方，这条产线总的投资额是102亿美元。这个产业的起步资金比一般产业要高。更加具有挑战性的是，这个产业需要持续不断的投入。

英特尔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公司，2017 年的研发投入是 130 亿美元。这个行业，如果你不进行持续的资金投入，很快会被淘汰掉。

第二个特点是人才密集。专业人员占整个从业人员的比重是比较高的。从上海 2017 年的情况来看，总的比重要占 38%，设计端的比例达到 70%。公司的高管需要有非常深厚的行业经历。今天，我听中微的尹博士讲，他们最核心的员工有 165 个人，这些人从业的年限算在一起超过 3000 年，领头的人要有很深的行业背景。

第三个特点是技术密集。集成电路这个行业需要很多基础学科的支撑，包括物理、化学、数学、工程等专业。我们投的中微半导体，它是做刻蚀机的，一台刻蚀机的产生是由 50 多个学科的科研人员共同完成的，他们公司的人员来自于全球 10 多个国家。

第四个特点是产业链协同经营。在华为手机中，大家比较熟悉的一款芯片叫麒麟 980。这一款芯片的 CPU 使用的是英国 ARM 公司的构架。这是一款 7 纳米的芯片，芯片是在台湾的台积电制造的。台积电生产这样一款芯片，一定要用到荷兰 ASML 的光刻机。所以一颗芯片的诞生，是产业链中各个环节共同努力的结果。

第五个特点是它需要市场化经营。集成电路产业的投资非常大，所以它要收回成本，芯片要有广泛的市场的市场前景。作为市场化的产品来讲，有几点很重要。第一，它不能侵权；第二，集成电路的整个制造流程有 1000 多个步骤，它对整个生产流程、对供应链的管控都非常严苛；第三，消费电子产品升级换代非常快，所以芯片需要根据市场的要求不断迭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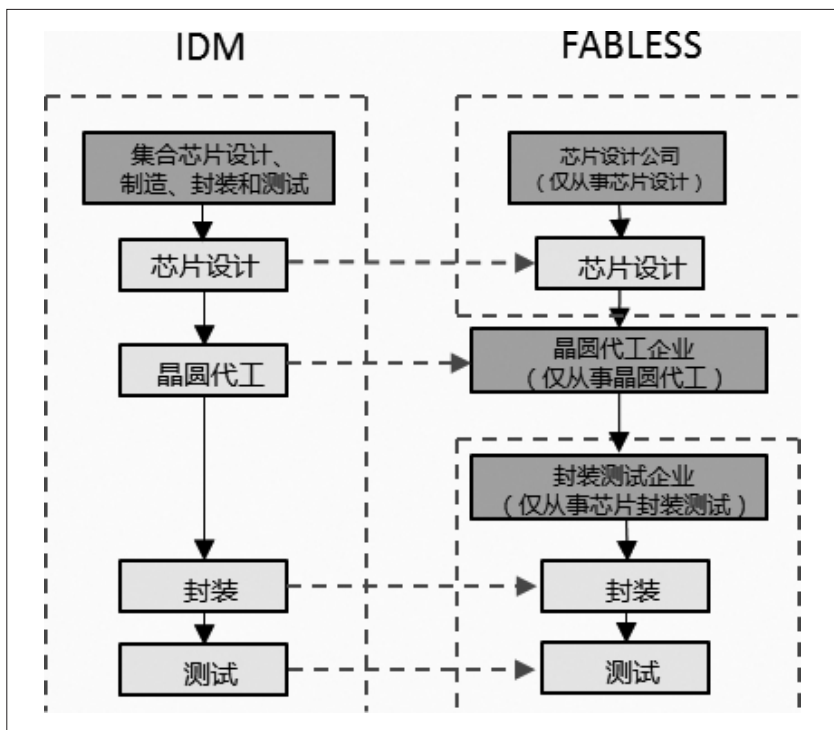


图 2：整合模式（IDM）、垂直加工模式（Fabless）

结合整个产业链的特点，我来回答乔会长给我出的一道题：为什么我们在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造出了两弹一星，而我们现在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的高端芯片仍然受制于人？我想主要是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这个产业是一个快速前进、竞争激烈的产业。我们国家很多年来，对这方面投资是不足的。我们和国际上存在几十年的差距，我们现在要追赶的不是固定不变的目标，而是一个不断前进的目标。第二，集成电路的产业链非常长，材料、装备等各个方面都可能会成为一个制约点。以光刻机为例，光刻机难度非常大，光刻机和航空发动机一起被称为制造业皇冠上的明

珠。我们要把这些短板一个一个补齐，这需要时间。第三，军品和民品不一样。军品的量非常小，可以不计成本；集成电路是大规模生产，所以它对整个生产的管控等各方面的要求完全不一样。军品重点关注的是安全，不能有后门；民品关注的是不能侵权，现在诸多专利已经把能保护的地方都保护起来了，要绕开这些专利，难度是非常大的。我认为主要是这几个方面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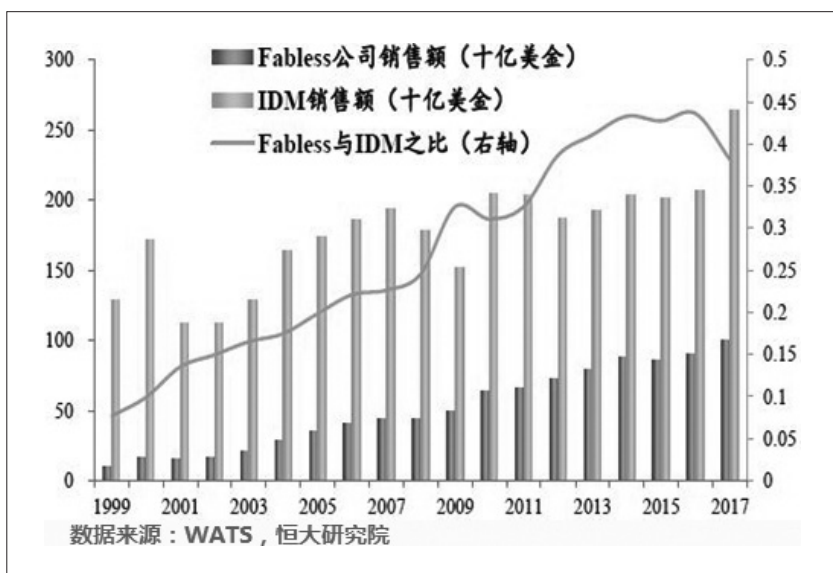


图 3：IDM 与 Fabless 市场对比

现在集成电路的运作模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整合模式（IDM），一类是垂直加工模式（Fabless）。IDM 是从设计开始，设计、制造、封测全部自己来做，比较典型的企业有英特尔公司、韩国三星公司。FABLESS 模式是做专业化的分工，设计公司只做设计，比如华为海思；制造由专门的代工厂来做，比较有名的是台积电；封测由专门的封测厂来

做，比如长电科技。现在从整个市场范围来看，IDM 模式的市场份额还是大于 FABLESS 模式，但是从整个增长趋势来讲，FABLESS 模式的比例在不断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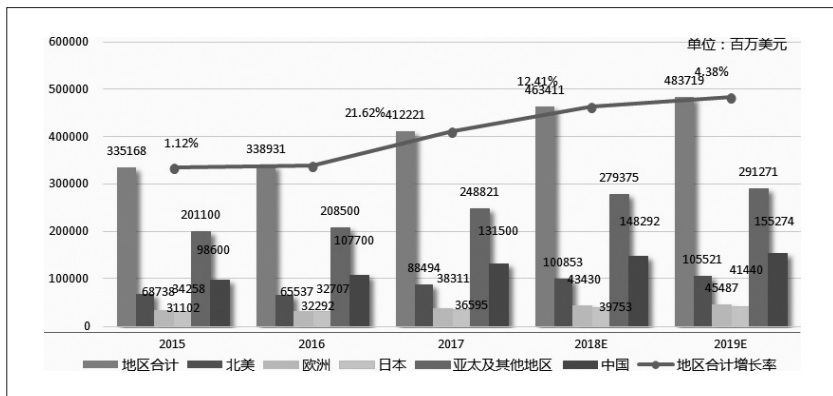


图 4：2015—2019 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和区域分布情况

从全球半导体的情况来看，从总量上来讲，还是保持稳步增长的态势。地区主要是集中在北美、欧洲、日本和亚太地区，2017 年全球半导体整个市场规模是 4122 亿美元，中国大概占到 30% 左右。

排名	设计厂商	所属地区	设备厂商	所属地区	制造厂商	所属地区	封测厂商	所属地区
1	高通	美国	应用材料	美国	台积电	中国台湾	日月光	中国台湾
2	博通	新加坡	泛林半导体	美国	格罗方德	美国	安靠	美国
3	英伟达	美国	东电电子	日本	联电	中国台湾	长电科技	中国大陆
4	联发科	中国台湾	ASML	荷兰	三星	韩国	矽品精密	中国台湾
5	苹果	美国	科天	美国	中芯国际	中国大陆	力成科技	中国台湾
6	AMD	美国	迪恩士	日本	高塔半导体	以色列	天水华天	中国大陆
7	华为海思	中国大陆	细美事	韩国	力晶	中国台湾	通富微电	中国大陆
8	赛灵思	美国	日立高新	日本	世界先进	中国台湾	京元电	中国台湾
9	马威尔	美国	日立国际电气	日本	华虹宏力	中国大陆	联测科技	新加坡
10	紫光集团	中国大陆	大福	日本	东部高科	韩国	南茂	中国台湾

数据来源：Company reports, IC Insights, Trend Force

图 5：2017 年产业链各部分排名

从产业链的情况来看，产业链的四个部分中，设计、设备代表产业链价值比较高端的部分，制造其次，封测这一端难度相对比较小。从设计厂商来看，基本上美国公司居多。中国大陆有两家，华为海思和紫光。设备厂商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日本。制造厂商排名第一的是台积电，大陆也有两家上榜，是中芯国际和华虹宏力。封测排名第一的是日月光，这一块大陆也是不错的，包括长电科技、天水华天和通富微电。



图 6：全球各区域的专长

我们来看看各个区域的专长。美国掌握了整个价值链的最高端，就是设计和装备。欧洲最厉害的是光刻机，最高端的光刻机只有荷兰的一家公司可以生产，欧洲的汽车电子也是不错的。韩国存储芯片的市场占有率最高。日本的材料占全球 60% 以上。台湾的强项是晶圆的代工和封测。中国大陆还是一个追随者。

从中国大陆的情况来看，我们集成电路产业保持比较高速增长。近些年大陆都保持 20% 的增长，2017 年的增长速度为 28%，整个市场规模达到 5411 亿人民币。可以看

到，大陆集成电路进口规模非常大。连续几年我们都保持了两千亿美元的规模，2017 年达到 2600 多亿美元。我们的石油进口量大概是每年 1000 多亿美元，所以进口最多的不是石油，而是集成电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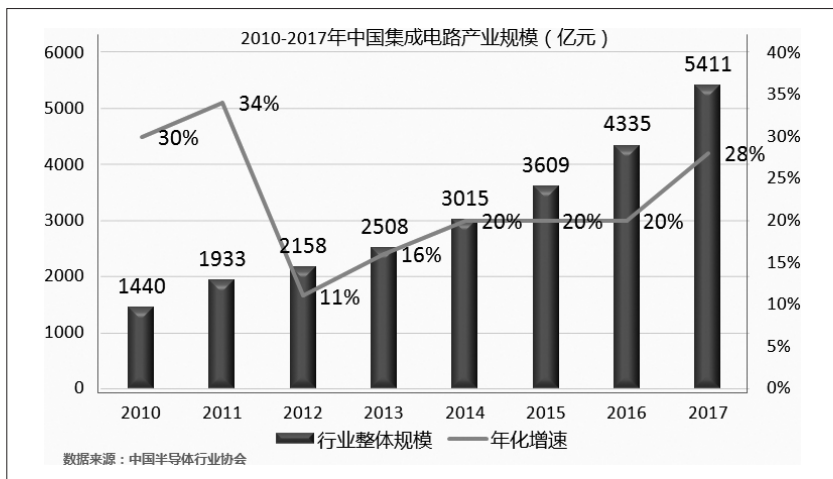


图 7：国内集成电路产业持续增长

我们集成电路的差距到底有多大？一般来讲，比较低端的芯片，还有消费类的芯片，我们是比较好的。但是一些高端的芯片，比如 FPGA 和存储，我们还是比较弱的。从设备来讲，我们和国际差距比较大。以光刻机为例，ASML 的 EUV 已经实现了量产。我们国内最先进的是上海微电子装备，现在的水平达到 90 纳米，我们目前还只能做到封测端，进不了制造端。在制造这一块，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能够做 7 纳米的是台积电，最近三星也实现了量产。大陆最先进的是中芯国际，现在已经能够实现 28 纳米的量产，14 纳米还在推进过程中。台积电已经在研发 5 纳米，预计在 2019-2020 年将实现量产。封测这一块，国内不错，我们已

经能够涵盖 90% 的工艺。

要看到我们和世界一流水平的差距，同时也要看到这些年来我们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我简单的把我们的集成电路发展历史做一个回顾。集成电路 1958 年诞生在美国。50-60 年代，中国集成电路完全靠自力更生，因为那时候西方对我们国家是禁运的。我们集成电路的起步也不算晚，我们的硅晶体管的诞生比美国只晚了四年，集成电路晚了七年。到了 70-90 年代，国家减少了对电子行业的投入，希望各个电子厂能够到市场上去寻求效益。为了在短期内取得比较好的效益，我们大量购买国外的技术和生产线，自主研发的思路被购买引进所替代。1980 年江南无线电器材厂全套引进了日本东芝的生产线。这是我国首家具有现代工业大生产特点的集成电路厂。这家企业的效益非常好。随后国内 30 多家企业花了 13 亿，陆陆续续引进了很多生产线，但是真正能够做成的却不多。这也提醒我们，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大家一哄而上也会造成非常大的资源浪费。1988 年，上海无线电十四厂和贝尔公司共同设立贝岭微电子，建设了大陆第一条 4 英寸晶圆生产线。1995 年，我们吸取了 908 工程的教训，由当时的电子工业部的部长胡启立同志牵头开展 909 工程，设立华虹 NEC，这是现在上海华虹集团的前身，也是当初投资最大的项目，投资了 100 亿人民币。就在上个月，胡老还来参加了华力二期 12 英寸先进生产线的投产大会。

到了 21 世纪，我们走的是自主创新和国际合作的道路。2001 年，国家启动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设计专项，在专项的支持下，申威的芯片用到了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上，龙芯用在了北斗卫星上。2006 年，国家出台了《国家

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这个纲要中有 16 个专项，其中包括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排在第一位和第二位的专项都和集成电路有关。我们有幸参与了专项中一些项目的建设，参与了项目的筹备和设立。陪着企业一路过来，觉得这条路非常不容易。盛美半导体去年已经在纳斯达克上市了，当初这家公司在上海松江设立，当时招不到人，他们就到张江去做招聘，松江和张江听上去差不多，结果真的招到了一个员工，这名员工陪公司一起走到了现在。2004 年，我们投了中微半导体，到现在 14 年了，其中有 10 年左右的时间在打知识产权的诉讼，好在这些诉讼我们都是赢的。中微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还有就是一直要开政府协调会，因为缺钱。这些企业的发展历程让我有一些体会。一是这个行业需要静下心来做。现在看这些公司都非常光鲜亮丽，尤其是即将推出的科创板，这些企业很可能在科创板上市。但是他们走过来的每一步都真的非常不容易。二是希望给真想做事的、有能力做事的企业更多的投资，让这些科学家能够花更多精力做研究。

2014 年，我们国家颁布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在这个纲要的指引下，成立了国家的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我们一般把它叫做大基金。规模是 1387 亿。现在据说二期资金已经达成出资意向，大致是 2000 亿，目前还在等国家批。地方现在也在做集成电路产业的投资基金，去年达到了 3500 亿，今年要到 5000 亿。上海的集成电路基金规模是 500 亿，分为三部分，一是专门针对制造的，规模 300 亿；二是针对设计的，规模 100 亿；三是针对材料和装备的，规模 100 亿。

我们这些年取得的成绩，一是产业的结构日趋优化。

2010 年时，在设计、制造、封测三个部分中，占比最高的是封测，占 43%，设计占到 25%。到 2017 年时，设计占大头，达到 38%。二是技术水平提升，企业竞争力明显增强。全球排名 50 强的设计企业，2009 年时我们只有一家华为海思，到了 2017 年我们已经有 12 家企业能够进世界 50 强。值得一提的是，2015 年美国商务部宣布，国外有了和美国编码性能相当的刻蚀技术能力，因此取消对该编码项下的设备的出口限制。这指的就是我们中微的刻蚀机。美国对于中国的出口限制，其实一直都有，不是从最近的中美贸易摩擦才开始的。美国出口给中国的设备一般比世界最先进的水平低两代。三是我国的企业和资本走上国际并购的舞台。在 2015 年和 2016 年的时候，国际并购比较热闹，2017 年比较少，2018 年更少。我们希望通过并购获得技术和相关的市场。四是在我们走出去的同时，海外企业也走到了中国，包括英特尔、高通、台积电等等，都纷纷在国内建厂或者布点。中国的广阔市场是他们在此建厂的原因。在中国建厂，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市场，能够和客户贴得更近。

贸易摩擦给我们带来一些挑战。第一是人才的培养方面。我们原来的企业家可能有比较相似的经历，国内名校毕业，然后到海外深造，之后在海外大公司工作，工作到一定的职位以后回国创业，带动国内的产业的发展。所以，工作、留学是集成电路产业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现在，美国对于这些敏感行业的留学签证从原来的五年降为一年。在工作方面，网上曝出荷兰的 ASML 公司禁招中国籍员工。后来他们出来做了澄清。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籍员工到国际上知名集成电路企业工作存在一定的困难。现在美国出了一个政策：凡是参加中国人才计划的，美国国防部可以不给

相关的培训和研究的经费。据我所知，这一条还是抓得非常紧的。

第二是技术升级方面。原来我们希望通过做并购，来帮助我们的技术升级。现在，不仅仅是美国，包括欧洲，对集成电路这个产业都非常关注。所以我们能买到的东西，基本上是我们不一定想要的东西，我们想要的东西，人家不一定肯卖。

第三是设备和材料的稳定供应。在 12 寸线中，98% 的设备和 95% 的材料基本上需要依靠进口。我们现在的 12 寸线已经建成的有 10 条，计划要建的在 16 到 18 条。如果关键设备没有的话，整个产线就建不起来。另外，我们已经在用的生产线的耗材储备量一般是两三个月，如果缺少关键的某类耗材的话，也可能对我们已经在用的这些生产线造成影响。所以中兴事件出来以后，引起了大家的一些担忧。初步感觉是应该不会全面断供。因为包括美国公司在内，这些国际大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额占比非常高，如果不卖给中国的话，中国会受到影响，但他们自己也会受到较大的损失。另一方面，中国的生产线不是国际上最先进的，所以也不在限售的范围中。

第四是终端产品在美国的禁售。华为手机不能进入美国市场。终端限售会影响相关的设计、制造、整个产业链的情况。

从应对来讲，首先，还是要加大资金的投入。很多人会认为国家大基金、各个地方资金的投资都非常大。其实我们可以算一下，国家大基金是 1300 亿到 1400 亿人民币，折算成美元不到 250 亿。大基金 2014 年设立的，到现在为止有四五年的时间，折算到每年来说，资金其实不算多。我希望

一是这些资金真的能够全部到位。二是这个行业不是有钱就能任性的，不是单靠钱就能砸出来的。它需要有人，需要技术。所以我觉得，各个地方政府在投资的时候，除了钱要到位，还要考虑到人和技术的到位。三是对于重点的企业，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

其次，要加大自主研发的力度。一是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个在后面讲。还有就是加大国产替代的力度。上个星期，我在上汽跟他们聊国产芯片的事情。因为汽车的安全性要求非常高，只要有一个事故，就会影响企业的声誉。同样，集成电路产线的投资，需要几十亿或上百亿美金。一台光刻机最贵要 1.2 亿美金，一般的光刻机也要几千万美金。一台设备有问题的话，就会导致整个生产线受影响。因此，国产替代受众多客观因素的制约。中兴事件爆发以后，明显感觉大家对国产替代问题的重视，意识到还是要重点扶持我们国内的芯片产业。我们现在在看的一个项目，有可能就会用到上汽的一款汽车上。大家放心，这不是最核心的芯片，所以绝对不会影响汽车的安全。我们有一家企业是做芯片设计的，负责人非常高兴地告诉我说，原来和华为很难谈，因为华为对价格特别敏感，对性能指标要求非常高。现在他和华为谈的时候，只要满足华为的核心要求，在指标上稍微差一点，华为也能够接受，价格高一点，华为也能接受。这是可喜的现象，让我们国产的芯片也好，设备也好，可以有试错改进的机会。

第三，要加强人才培养的力度。因为现在整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大概在 40 万左右，到 2020 年初步统计整个缺口在 30 万。集成电路这个行业，毕业生不能直接拿来就用，还需要有实践、培养的过程。因而还是要加强人才培养的力度。

第四，要加大国际合作的力度。因为整个集成电路产业链是国际性的，所以需要我们有国际的视野，吸取他人所长，利用好国际的资本、人才和技术。同时在国际合作中，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以及合规经营的意识。

接下来我举两个案例，一个就是 10 月底发生的晋华事件。这个事件的一方是福建的晋华和台湾的联电，另一方是美国的美光。福建晋华是 2016 年 2 月新成立的一家公司，做 12 英寸 DRAM 生产线，DRAM 是存储芯片的一种，项目总投资额 56.5 亿美元。联电是台湾的一家企业，是台湾第一家半导体公司，也是世界上第三大代工厂。双方合作的基本模式是联电出技术，福建晋华出资金、出场地。美光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一家半导体公司。DRAM 市场基本上被三家公司垄断，韩国的三星和海力士、美国的美光。整个故事是这样的，2017 年 12 月，美光控告联电和晋华侵权，紧接着在今年 1 月，晋华在福州提起诉讼，控告美方侵权。2018 年 7 月，福建法院裁定，禁止美光制造、销售和进口侵权的产品，这部分产品的销售额大概占美光全球销售额的 0.5%-1%。9 月美光再次在美国对晋华提起诉讼。10 月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将晋华列入到限制出口的实体清单；当天，美国的两大设备商和人员从晋华撤出，联电也决定暂停和晋华的合作。11 月，美国司法部又发布公告，以窃取美光的商业秘密为由起诉福建晋华、台湾联电以及在联电的工作人员，据说涉嫌窃取的技术产权的价值超过 87.5 亿美元。如果控诉成立的话，两家企业可能面临 200 亿美元的罚款，个人也可能刑罚。因为这个事情刚刚发生，所以最后的走向如何，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这个事件也给我们敲响了关于

知识产权的警钟。

我想讲一下我们投的中微半导体公司是怎么样做知识产权保护的。在它设立的 14 年中，主要有三起法律诉讼，分别是与应材、LAM 和 VEECO。我把三个案子理了一下，和大家分享。我觉得打知识产权官司的目的，主要有 3 个。一是出于维权的目的。二是要把新的竞争对手扼杀在摇篮中。比如福建晋华，一旦涉及诉讼，美国的设备厂商撤离导致工程停顿；由于工程的停顿，很辛苦招来的员工可能会离职；投了这么大的金额，每停顿一天，财务的压力都非常大。更加糟糕的是，它会对整个公司的形象有非常不利的负面影响。所以公司很容易被这样一些诉讼拖死。三是为了争取到专利的互换或市场的互换。

知识产权打的点有几个，一是会打商业秘密侵权。中微的董事长曾做到应材公司的副总裁。应材公司就起诉他，说他把应材公司的商业秘密拿到中微发展。二是打公司的产品，三是打公司的供应商。VEECO 打的不是中微，而是中微非常核心的供应商，通过阻断核心供应商对公司提供材料，给公司造成致命的影响。

那么如何来应对呢？我觉得有几点。第一，还是要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真正的做到不侵权。中微就要求所有进来的高管都要签承诺书，承诺不从原来的公司带来技术。第二，要建立知识产权管理的体系，就是要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建立相关的制度。中微所有的研发在电脑中都是有记录的，即使碰到诉讼，也能够提供技术的来源。第三，要积极应诉。中微主要做两个产品，一个是刻蚀机，一个是 MOCVD。公司围绕这两款产品的 3000 个专利进行专利分析。所以当别人打它官司的时候，它能够抓住对方的

把柄，进行反诉。第四，要培养多元化的供应商，尤其是核心产品的供应商，不能吊在一家上面，要培养二供三供。

接下来看中兴事件。美国禁止美国的科技产品出售给伊朗，在 2012 年 3 月，中兴把一些设备卖给了伊朗电信，所以 2012 年美国就对中兴和伊朗的交易展开了立案调查。2013 年，中兴为了规避美方监管，不直接和伊朗发生贸易，而是通过第三方进行贸易。更加糟糕的是，2014 年美方在中兴高管秘书的电脑里发现了两份如何规避美国监管的文件，这成为日后美国起诉它的一个重要证据。2015 年中兴向美方提出了和解。在和解过程中，中兴对美国聘请的第三方中介调查试图隐瞒。最后美国对中兴提出了三大指控：串谋非法出口、阻挠司法以及向联邦调查人员做虚假陈述。2017 年 3 月，中兴支付 8.9 亿美元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故事的前半段，简单的来讲，是中兴违规，美国制裁，中兴花钱了事。但是转折在哪里呢，就是在 2018 年 4 月，美国商务部公告，禁止美国企业和中兴公司发生业务往来。这对中兴的打击是致命的。这个事情引起了大家对集成电路产业高度的关注。在 6 月，最终达成了和解协议，中兴付 10 亿美元，美国合规团队进入中兴，中兴更换所有的董事和高管成员，美国把中兴从禁售名单中撤除。

我觉得这个事件有值得我们深刻反省的地方。因为我们要参与到国际价值链中，合规是必须的。我们投的盛美是做清洗设备的，公司董事长在两件事情上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第一件事，他跟我讲要研发一个新设备，已经开始了对相关专利的分析。我觉得在这点上，他表现了很强的知识产权意识——不能侵犯人家的权益。第二件事，就是晋华事件发生的第三天我碰到他，我知道盛美有设备卖给晋华公

司，就问他，这对盛美的影响到底怎么样？他说，昨天晚上他紧急联系美国律师，研究美国的法律，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希望走国际化的道路，而要想在国际化道路中走得长远，合规是必须的。

简单的做一个总结。对于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我认为，第一，坚持自主创新、做好持久战的准备。技术创新是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根本，最核心最关键的技术还是要自己突破，这些突破需要长久的努力。第二，秉持开放的心态，遵守国际规则、加强全球合作。集成电路是全球的产业链，全部中国做不现实也不必要，我们还是要整合好全球的资源，来发展集成电路产业。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乔依德：非常感谢项总给我们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演讲，把集成电路的一些基本的概念、重要性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接下来大家可以提一些问题。

缪其浩：这是非常热门的话题，越是热门的话题越难讲。我听下来，你讲的很对。自从中兴事件以后，人人都变成芯片专家了。我的专业就是这个，当然我后来不做这个了。我的一位同班同学现在在美国，所以我对这个比较了解。你讲的很对。讲到人才，讲到研发，每个人都知道。我甚至可以讲，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就说要重视电子革命。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也讲要重视电子革命。但是这个领域和两弹一星，完全是两个事情。这个行业是一个非常能够体现全球供应链的行业。原子弹不是，原子弹根本不需要搞全球供应链，金正恩也不搞。这个行业一定是全球供应链，我们现在离不开国外。当然有一个非常极端的情况，就是中国完全脱离以美国为主的体系，不是不可能，但是那个时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所以我想，党中央一直在争取一个比较好的

国际关系，而不是像现在的很多大嘴巴动不动就要跟美国开打。中国要走向世界第一强国的路还很长，现在跟人家博弈，我们的筹码非常少。总有一天，我们可以跟他们博弈。到那个时候，也不是什么都我们自己干，而是我们能够跟人家交换，这是非常正常的解决方法。你讲的非常好，把整个故事讲的满贴切的，同时没有放弃掉合作，就是全球供应链。很多人都应该了解这个情况。

乔依德：你没有提问题，就做了一个评论。冯军，你是提问题，还是评论？

冯军：我提问题，我们和欧美大公司之间的差距有多大？比如说，差了多少年？我这个问题可能很外行，因为你说距离是动态的，人家也一直在往前走。我们老强调自主创新，但在全球供应链下，自主创新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真的觉得不清楚。这个差距到底有多大？你可以展开讲。

项亦男：我是这么来理解这个问题的。从集成电路来讲，它不是简单的一个产品，就是说，我们的差距不是点对点的差距。集成电路需要整个产业链的支撑。比如从 14 纳米到 7 纳米，不单单是制造工艺的变化，相关设备要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材料也要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这么多的变化导致最后芯片的差距。集成电路的产业链很长，各部分的差距不一样，很难简单地用一个数据来表达。从制造上，现在中芯国际能够量产 28 纳米，台积电做到 7 纳米，制造这一端差了 2-3 代，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清楚的。在设备上，刻蚀机差几代、光刻机差几代，这就很难讲了。对于设计来说，因为芯片的种类非常多，所以很难用一句话说明清楚。

冯军：具体来讲，华为也做芯片。

项亦男：华为也有芯片设计公司，华为海思是专做芯片设计的。现在做手机芯片的主要有三个，高通、华为海思和联发科。就芯片评分而言，我从外行角度看到过一篇文章，华为麒麟 980 的评分比联发科要高，比高通略低。我同意前面老师讲的，这是一个全球的供应链，所以对于我们来讲，还是要利用好全球的资源，最终做出高端的芯片。让芯片不受制于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要立足自己，哪怕是引进技术或与别人合作，最终还要提升自己的实际能力。

乔依德：还有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大家比较关注中美贸易战，这恐怕不是一两天能解决的，我们希望这次协调会有一个成果，所谓成果，就是能把比较紧张的形势降下来。我以前根本不懂集成电路，我跟项总一直在沟通，我跟她提出很多要求，比如要解释一下集成电路和芯片有什么区别，两弹一星能够搞出来，芯片为什么搞不出来。最后，我们再次对项女士表示感谢！也感谢大家参加我们的沙龙！

中美经贸关系与 WTO 的未来

崔凡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研究部主任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上海发展沙龙第 145 期 2018 年 12 月 14 日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各位来宾，我们今天的演讲马上开始。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了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国际贸易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崔凡先生。他是中国世界世贸组织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研究部主任，是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全球价值链专家组专家，同时他还是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评估专家。他于 1997 年获得对外经贸大学国际贸易硕士后留校，2002 年获得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经济学硕士学位，2006 年获得伦敦政经学校经济学博士学位和国际商法硕士学位。崔凡教授在 WTO、中国对外贸易方面的研究卓有成就。为什么这次会邀请他呢？因为我在网上看了很多他写的东西，非常扎实，碰巧 10 月份我们一起参加世界经济学会，互相交换了名片。他上个月比较忙，这个月我们特地请他从北京来给我们做演讲，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

崔凡（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研究部主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非常感谢乔老师，也非常感谢在座的各位前辈、各位老师。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场合，我来讲中美经贸关系以及 WTO 的未来。

中美贸易的摩擦，很多人讲是今年 3 月份开始的，实际是 301 调查是去年 8 月份开始调查的，那时双方已经有很多动作了。我感觉这个事情，虽然是中美之间的摩擦，同时也涉及到整个国际贸易体制的改变。从根本上来说，所有这些国际上的事情，最终其实反应出各国内部的矛盾，或者国内的一些困难。很多人认为，美国是因为国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把中国作为替罪羊，这是一种说法。我们先不说美国那边，中国这边也与国内不同群体之间的分歧有关。实际上在这次争论中，也反应出我们国内的很多问题，不同的人，不同的学派，或者不同的集团，对中国的改革，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存在不同的看法。这次的贸易摩擦使得不同看法之间的讨论，能够在比较广泛的范围内让大家看到，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从另一方面来讲，我觉得最终这个事情可能也会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贸易战肯定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从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推动这方面，以及甚至可能对 20 多年来谈判几乎没有进展的世贸组织来说，把它从目前这种死气沉沉的状态往前推一步的角度来讲，可能也是一件好事。

我自己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大家在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上，重叠共识特别少。写《正义论》的罗尔斯，有一个理论叫重叠共识论。一个社会要有良好的秩序，要能解决问题和分歧，要健康地往前推动，就需要有重叠的共识，不同宗教和意识形态是可能有一些关于公平正义共同的抽象的政治原则，有重叠的共识才有共同的语言，才能对话。但是，今天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不光在中国，很多地方例如台湾、欧洲、美国等，都出现极化（polarization），不像以前左派右派的观点都往中间靠，现在选举理论中的唐斯模型

(Downsian Model) 不管用了。今天世界各地越来越两极化，越是极端的人，越能保证自己的基本盘，越能获得更多的政治支持，声音越大。重叠共识越来越少，下一步怎么走？能不能仍然推动社会稳定发展？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孙斯坦教授有一个理论，叫做未完全理论化协议 (incompletely theorized agreements)。他说这个社会，如果重叠共识越来越少，达成一定共识的成本会非常大，我们就应该把抽象化的高层意识形态上那些分歧搁在一边，就具体的问题进行讨论。可能双方对整个大方向、大的意识形态的问题有很多分歧，现在就摆出的具体问题，就事论事，说不定有共识，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所以在这段时间，包括我写文章或和一些同事辩论的时候，我更倾向于使用具体的概念讨论具体的问题。少谈大的意识形态，先谈具体的问题。我跟美国的朋友说，少一点帽子，少一点修辞上、语言上的辩论，把具体的问题摆出来，说不定在具体的问题上比较好谈。

实际上这就是邓小平的智慧，邓小平能够在那样极左思潮的背景下，能够打出一条改革开放之路，就是在具体问题上谈起。今天我们需要重拾邓小平的智慧，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下一步能够达成共识的，可能不是所有制这方面的分歧，公有制私有制这些问题，公有制的具体形态，理论上完全解决恐怕要很长的时间。而在公平竞争上可能更多的人能够认同。所以在易刚行长第一次提出竞争中性的几个小时之后，我稍微带一点激动，赶快写了一篇东西。我说有一位部级领导在公开肯定竞争中性概念，这是第一次。我当时说，这个竞争中性的问题是我们能够在具体问题上、在更多的人群中达成共识的一个很好的契合点。现在看来，确实很可能在这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具体的动作。如果我们能

够抓住这些具体的点往前推动，我们可能在更广泛的人群中间，对下一步改革开放建立更广泛的共识。

今天我首先作一个关于中美贸易问题的简单概览。我平时讲这个问题，经常用四句话，这四句话要完整地放在一起：美方部分诉求情有可原，美方使用手段比较恶劣，中方实施反制迫不得已，中美长期合作非常必要。

我对记者也是这样讲。但有时候，记者容易把我第一句话去掉。第一句是讲，美方的部分诉求是情有可原，不是所有的诉求，或者我们讲，有一部分诉求和我们改革开放的总体方向是一致的，只不过他要的比较急，我们步子太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这次使用的手段确实相当恶劣，把整个国际法，特别是战后多年建立起来的国际贸易法中最基本的基石突破了。它突破的是关贸总协定的第一条，最惠国待遇，也突破了第二条，减让表。它把自己对中国的关税承诺，曾经给了中国整整 40 年的最惠国待遇，现在取消了一半。40 年前中美之间建交后，达成了一个中美贸易关系条约，在 89 年那样的情况下，这个最惠国待遇也没有收回去，结果今年收回去一半。中方实施一定的反制，上海很多朋友觉得不应该反制，但是我们实施这个反制，说老实话是迫不得已。如果没有这个反制，不光政治上站不住脚，而且在后续的谈判中也会很被动。虽然反制在某种程度上是迫不得已，但是中美的长期合作是非常必要的。闹到再厉害的时候，我们公布的中美白皮书里是这么讲的，一方面我们要坚定地维护中国的利益，但是另一方面要坚定地维护和推进中美经贸关系。在推进中美经贸关系这一点上，不管国内外有多少声音要脱钩，我们争取各式各样的方式，包括省州的合作，包括民间的合作，尽量维护和推进中美经贸关系。

这四句话就是我对整个事情的一个描述。

有的同志讲，我们中央的媒体好像对美国一会儿软，一会儿硬。我们在宣传上，以前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事，在具体措辞上前后是有一些差别，但是总体的基调没有根本的变化。有的时候有软化，有的时候比较硬，但是软化和强硬所针对的对象不一样。中方一直表明态度强硬的一面，是针对美国的违规措施，针对它的关税。中方表示灵活、表示友好、表示开放、表示同意协商的软的那面，是针对美国的一些谈判要求、开放诉求。这两方面是同时都存在的。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个人总结总的对美策略，用一句话总结的话，就是在坚持扩大改革开放的同时，对美国进行必要的反制。开始的时候，提的是对等反制，在国际关系中讲对等这个词也没有错。但是它给人一个误解，开始的时候，甚至有媒体，包括有关政府部门，用了“同等幅度，同等规模”，这个就把这个概念搞得太僵化了。本来目前中美贸易就是不平衡的，跟它差别那么多，要跟它同等规模、同等幅度，它一打上去，到2千亿，你就没得打了。这个既没有必要，也不够灵活。后来用了“必要反制”这个词，我们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既表明态度，也使自己的损失尽量降到最低。反制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必要性，一定的反制也是后续谈判的砝码。根本的应对之策，是加速开放和结构性改革，加速开放本身有利于提高我们的谈判地位，尤其汽车业的开放是个典型例子。另外，这个事情的走向，除了对我们国内改革开放的影响以外，后续会使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一个重塑期。

讲完这个概述以后，我想回答乔老师给我的作业，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美方一开始的时候，它的政府官员提出，是中国违反世贸组织规则，没有遵守中国入世的承

诺，是不是这样的？首先我告诉大家明确的一点，美方在这次 301 调查过程中反复声明，它并没有全面指责中国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它之所以这样讲，是要给 301 程序一个合法性。因为如果它真的指责中国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话，不说国际法，就是按照它国内的实施世贸组织规则的法律来说，它也必须要把 301 调查的结果交给世贸组织来裁决。但是它这次的目的，就是不想让世贸组织裁决。它的四项指控中最主要的技术转让这一项，它认为不是世贸组织管辖的领域，既然不是世贸组织管辖领域，所以就没有必要交给世贸组织来裁决，所以就有权用单边措施来打你，这是它的逻辑。所以在它正式的法律程序中，它并没有纠缠中国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问题。但是在舆论宣传上，包括它的一些官员、一些智库，确实多次地讲，中国破坏了世贸组织规则。

提到世贸组织规则，如果有一个国家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话，尤其像中美这样的大国，只要这个违反有一定的影响的话，肯定会有人来告你。在世贸组织里有争端解决程序，就是判断谁违法，谁没有违法，是有裁判的。世贸组织如果有人告状，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因为是国家到国际组织来告状，所以原告方没有一定的把握一般是不出手的。如果你告别人，基本有九成胜算；如果你被别人告，有九成会败诉，大家都差不多。有人计算过，基本上是 90%，美国稍微好一点，它被告的话，输 88%。所以，你被告的次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出你世贸组织中的合规性。中国在入世 17 年中，从 2001 年到 2018 年，在世贸组织中被告 43 次。那么美国一共被告多少次呢？151 次。但是因为它 1995 年 1 月 1 号就加入世贸组织了，要把中国入世之前的次数刨出去，在这之前它被告 56 次。中国入世以后，美

国被告 95 次，因为这段时间美国打贸易战，大家都在告它。世贸组织四大贸易方是中美欧日，欧盟在中国入世后的这段时间里被告了 52 次，也比中国多。表现最好的是日本，被告 20 多次，但是它的贸易规模比中国小很多。有人讲，日本诉讼文化比较少，就是不太喜欢诉讼，但是也被被告了 20 多次。我们可以看到，在世贸组织四大贸易方里，中美之间的贸易规模是差不多的，中国出口比美国多，进口比美国少，两方被告的次数差别却相当大，美国被告的次数要多得多。被告以后，基本上就是九成的败诉。

我们被告 43 次，这 43 次中被判败诉的也有很多，有些还没有判我们就同意了人家的要求，跟人家协商解决了。美国 2010 年的 301 调查，风能补贴的案子，我们当时跟它协商解决了。两边的谈判人员谈来谈去，中国觉得要打的话，这个官司输的可能比较大，我们就认了。所以说中国在世贸组织中 100% 一点没有问题，不能这样说，判你输就判了很多次，但美国被判输的次数更多。这在世贸组织中，应该是正常的，在某些条文的理解和执行上出现分歧是正常的。关键是在这个分歧出现以后，世贸组织判了你以后，你怎么对待。中国在世贸组织判了以后，绝大部分情况下，即使有时候我们觉得很窝火，输的很憋气，但只要判我们输了，基本上很快就能改。为什么？这个一判，输了，回来报给领导，世贸组织都判我们输了，那就改。美国呢，说句老实话，它的贸易谈判官员拿回去改，告诉总统，能不能改？不是总统一个人说了算的，两党之间，立法什么的，争来争去，贸易谈判官员想改，可能都改不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客观上来讲，美国在败诉的情况下，很多的裁决是没有执行，或者是拖延执行的。在它拖延执行的情况下，世贸

组织接下来有什么程序呢？胜诉方又到世贸组织去告败诉方没有执行好。这种执行之诉，也反应出你尊重世贸组织裁决的程度。中国在 43 个案子中，被打执行之诉的，只有两起，都是美国告的。有一起是反倾销的案子，打了以后，告我们没有执行好，但没多久那个反倾销措施就到期了，违规措施就取消了，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也就算结案了。唯一的一个到现在没有完全结案的，是关于肉鸡的案子，商务部前一段时间发表了一个讲话，说正在执行过程中间。所以，我们基本上履行了世贸组织的裁决，败了就认了。美国被告的 95 个案子中，一共有 9 起执行之诉，宽泛一点的说法可能有 11 起。如果执行之诉又输了，还不履行，怎么办呢？世贸组织还有下面的程序，要求你补偿，或者授权胜诉方对你进行报复。在美国的这些案子中，一共有 6 起案子胜诉方要求世贸组织授权对美国报复，有三起已经授权对美国进行报复了，中国目前还没有面临别人要求对中国报复的例子。美国至少是有那么几起案子，到最后它也不执行。针对这个问题，美国的态度是什么呢？它认为这个事情不是它的责任，是世贸组织裁判不对。所以在奥巴马政府末期，它就开始打世贸组织。当时有一个韩国大法官叫张胜和，美国就拒绝让他续任。后来争了半天，其他的大法官都维护他，但是美国坚决不让他续任，有人认为美国的做法等于干预世贸组织的司法，但是有它这么顶着，程序就走不下去，最后张胜和自己就放弃续任了。后来又补了一个韩国人上去，这个事情暂时告一段落。

到了特朗普上任了以后，他来了更绝的，所有大法官，不管是续任还是后面新选的，所有人都不能上。这样的话，一共七个法官，一个一个的被杯葛掉，到现在只剩下三个，

到明年只剩下最后一个，到明年世贸组织的上诉机构将面临停摆。这就是为什么最近中国、欧盟、印度联合提出提案，要求恢复上诉机构大法官遴选，提案中满足了美国的一些诉求，但是同时要提高上诉机构的独立性，恢复大法官的遴选。这两个提案在提出之前，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肯定不会让它通过的。因为美国的不满不光是对上诉机构的，是对整个世贸组织的不满。也就是说，明年确实有上诉机构停摆的可能性。我们讲是否违规起码有个程序正义问题，它现在反身一拳，先把裁判打晕了。中美之间有很多案子，现在一审过了，二审还没有走。如果到明年二审走不起来，很多案子根本没有办法裁判。今年有大量的国家告美国，这些案子估计最后都没有办法裁判，都不会有结果。因为美国在这一段时间发起贸易战之前可能也预测到，告它的案子会比较多，它败的可能性大，所以干脆把裁判打死了，目前就是这样的状态。

从这个过程中，大家可以看出一个基本判断，中国和美国在世贸组织的合规性里，我说一句客观的话，中国不是一点毛病没有，但是中国的合规性不比美国差。实际上中国在 2011 年入世 10 周年的时候，讲我们的承诺在 2010 年已经全部履行到位。当时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也讲了一个话，他基本肯定中国履行了承诺，虽然没有做到 100%，当时他是这么一个评判。美国每年要出一个合规报告，在特朗普上任之前，它的评价都是可以的。但是最近两年的报告，都是对中国全盘否定。但是它在 2017 年的报告中有这么一句话，它说我们确实认为主要的问题出在世贸组织不管辖的领域。所以它有这么一个说法，现在的世贸组织无法规范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经济体。

与此同时，美方的智库放出了一些文章，比如 ITIF，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是美国 301 调查的主要证人，在 2015 年出过一篇文章，有一个表列出了中国的 11 项入世承诺，每项后面写 NO、NO、NO。这个表后来被翻译成中文，在国内的网站上广泛流传。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反驳这 11 条，可以说这 11 条基本上都是似是而非的，严格来讲大部分都不是中国的入世承诺。为什么说似是而非呢？它说中国承诺开放电信业，我们在入世承诺书中关于开放电信业一共有 4 页纸，这里面讲开放基础电信、增值电信，除了讲这个以外，有大量的市场准入限制与国民待遇例外。实际上在中国的入世承诺中，不管是基础电信还是增值电信，都没有允许外方控股。关于金融的开放一共 9 页纸，这里面也是有大量市场准入限制和国民待遇例外，包括列出来的业务范围都是有限的。如果我们一个一个对着看的话，那么中国的入世承诺的履约是不错的。这里面的很多承诺，如果在网上看的话，很多表都是简化的，一简化就来这么一句，比如开放证券业。但如果你看具体内容，当时承诺开放证券业，开放的是三分之一股权，外资股份不超过三分之一。我们谈判谈了多少年？谈了 15 年。谈什么东西？一方面是他们要给我们加紧箍咒，一方面是我们立防火墙。当时的入世承诺水平在当时确实是比较高的，但是今天看来，实际上水平是有限的。所以我们看入世承诺的时候，一定要具体地看。

另外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大门开了，小门没有开。中外合资的电信企业是允许的，虽然外方不能控股。但是，中外合资电信企业受到的限制，比纯内资企业受到的限制要多，等于在里面设了一个门槛。这样的现象有没有呢？可能有，监管的过程中可能这个有偏差。这个问题确实需要承认，也

需要进一步解决。服务贸易总协定讲国内监管要做到合理公正，但是对于具体纪律，第六条第四款里面讲以后继续谈判来制定必要的纪律。世贸组织里面有很多内容没有具体的规则。这种问题，不光中国有，世界各国很多地方都存在。美欧之间为什么 TTIP 死活谈成不了？就是在标准制订问题上，总是无法达成一致。因为美欧之间的水平性竞争问题，在标准上面，他们的矛盾比我们这种互补型的经贸关系更难达成一致。世贸组织服务贸易补贴也是一个空条款，需要以后接着谈，现在没有规则。那么有人讲，是不是中国故意钻空子，玩狡猾，不诚实？我们要怎么看待这些事情呢？如果美国利用法律的话，它利用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时候，它的律师经常是怎么样呢？充分利用，在这方面他们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玩花招，钻空子什么的，说老实话，跟美国的法律水平来比，其实差的远。实际上世贸组织没有规则的地方，就是大家对这个规则谈不拢，有不同意见。没有规则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国内法的主权，是我们的政策的灵活性，从这方面讲，我们没有太多理亏的地方。如果真有空子的话，是世贸组织历史上最大的空子，就是自动出口限制，美国这次还是想使用这个方法。世贸组织讲得很清楚，一般禁止数量限制，出口数量限制和进口数量限制都要禁止，但是它对出口的数量限制管得要松一点，进口的数量限制管的严。所以在历史上就出现什么情况呢？美国想限制日本的汽车进口，它不自己限制，它就告诉日本，你自己限制，你要不限制，我就限制你，等到这个时候呢，你吃亏更多。日本只好自己先限制。虽然这是明显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事情，但是日本自己限制，它不会去告，自己搞的措施它不会去告；而受影响的是美国，美国也不会告，没有人告，这就

是灰色区域措施，这种措施我认为才是真正的钻空子。所以在世贸组织合规性的问题上，我觉得中国没有太多理亏的地方。

但是有一点，我们确实要认识到，我们维护中国在世贸组织的合规性，不能否认我们扩大开放的必要性。中国的关税水平在入世的时候，应该说是比较合适的，今天看来关税水平严重偏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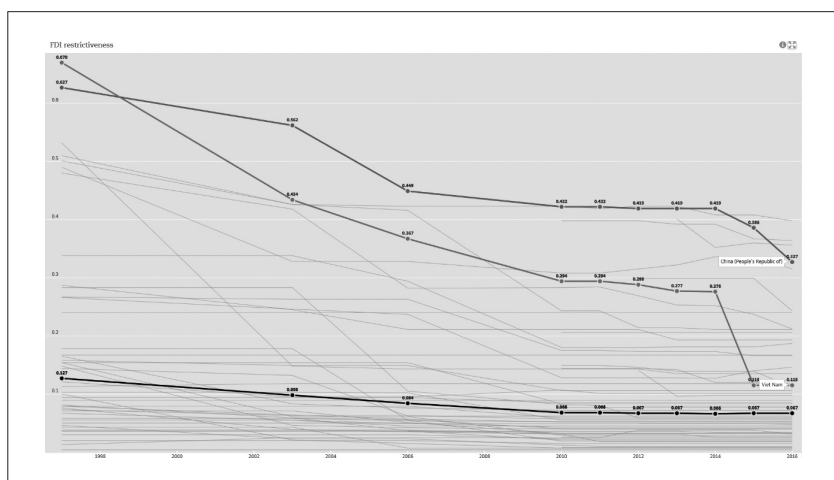


图 1：OECD 的投资限制性指数

中国从 1997 年以来，投资壁垒下降的幅度，在国际上也排在前面。但是降到今天，中国在 2016 年、2017 年 OECD 的投资限制性指数排名中高居前四位。图 1 是 2016 年的数字，第四位，2017 年也是第四位。最上面那条红线是中国，限制性指数越高表示你限制程度越高。最开始 1997 年的时候，我们是第二名，越南最高。后来越南进步比我们快，中间那条蓝线是越南，下面的黑线是 OECD 的平均水平，越南和 OECD 越来越接近了。我们在 2006 年到

2014 年的那段线基本上是平的，那时失去了一个扩大开放的好时机，当然也有一些客观的原因，包括金融危机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限制程度在 60 多个主要经济体中高居榜首。今天我们是第四名。我们具体的各个领域，到 2017 年时，传媒业壁垒遥遥领先 68 个主要经济体排名第一，电信业壁垒第一，金融业壁垒第二。今年 6 月 28 日清单公布了以后，22 个领域扩大开放，很多人感到扩大开放的速度太快了，金融业全部开放了，三年之内所有股权限制甚至业务限制全部取消，铁路旅客运输要允许外资独资，电网运营与建设允许外资独资。很多人觉得，这个开放程度开的太猛了。我们确实需要注意在开放过程中的风险，但是客观上讲即使是今年的清单落地之后，我估计在 68 个主要经济体中也只能排在十几位到二十位，并不代表你开放水平有多高。因为现在整个国际上对资本开放的程度就是这个样子。缅甸本来比我们开放程度低，几年下来就跑到我们前面去了。现在东南亚在这次贸易战中赚了大便宜了，很多资本往那里跑。2016 年我们有那么多资本往外投资，去买这个，买那个。但人家到你这里来，这个有股权限制，那个有个业务限制，所以人家说你不对等，这个确实有它的道理。

美国其他对我们不满的原因，我就不多说了。但是有一点，我们实际上这些年，一直也确实希望能够尽量满足欧美对我们开放的诉求，最近几年开放程度确实是扩大的，2014 年以后投资限制程度每年是明显下降的，但国外投资者的不满却仍然很多。特别是这一次中美贸易摩擦，长期以来为中国说好话的外商投资企业，这次都不怎么对中国说好话，因为这些年他们积累了很多的不满情绪。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它想在价值链上游、下游扩展一下，但是这里也挡住，

那里也挡住，可能它有一部分利润也被上游的国有企业卡过去了。前几天美国商会一个代表跟我们吃晚饭，说你们能不能把反垄断法中对国有企业的豁免取消掉啊？他把《反垄断法》第七条的规定成为对国有经济的豁免。我说不知道会不会，但是你这个提法也可能有一定的道理，可能是竞争中性的要求之一。因此在这段时间里，在美国工商界，在美国各个利益集团的要求之下，不光是特朗普，以前奥巴马就对中国采取了很多措施，想推动中国的开放，而且想解决他们认为的一些不公平竞争的问题。这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问题，体现在 301 调查中的几项指控中。这几项指控中这里就说最主要的一项指控，直接跟这次加征关税有关的，是强制技术转让。这个概念比较模糊。中国在入世议定书中有一个第七条第三款，有一个承诺：外资到中国来投资，中国不以转让技术为前提允许其准入。中国认为，这一条我做到了，我们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说，外资进来，我要求你转让什么技术，政府从来没有提出这个要求，如果哪一个政府部门提了这个要求，你可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去告。

但是美国认为，首先的一个担忧是外资审批制，意味着商务部外资司可以审批，那么我的合同、章程交给你以后，到底能不能批，你不透明，这样就暗藏着对转让技术的压力。你的外资审批部门的态度似乎是，如果你有转让技术，我就批得快一些，企业能感受到这种压力。在这个要求下，2013 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国就承诺以准入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与美国进行双方投资协定谈判。9 月份上海就搞了负面清单。实际上在上海自贸区，首先取消了外资的审批制，外资实行备案。经过三年之后，2016 年 10 月 8 日在全国推广。全国推广以后，97% 的情况实际上不要审批了，

只要网上备案就行了，这个就算部分解决了。美方说这个其实没有太解决，因为它最关心的问题恰恰是负面清单上的东西，那些股权限制，比如汽车、造船，飞机制造等这些领域，当然还有金融电信。也就是说负面清单上的股权限制太多，而股权限制是强制技术转让中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外资进来，必须要和内资合资，合资时国内合作方就会说，你必须转让什么技术，这是商务谈判，政府就说这跟我没有关系，是你商业谈判的事情。但是外资认为，如果中国政府不要求我搞合资，我就可以独资，就不会受商业谈判的压力。在这种要求下，政府现在干什么事情呢？这几年在不断压缩负面清单。大家可以看到，在上海自贸区也好，全国也好，实际上压缩的速度还是很快的。今年全国只剩下 48 条，自贸区只剩下 45 条，而且后面还会进一步压缩。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开放压力测试。

在压力测试的过程中，实际上压力一下子就测出来了，2015 年 811 汇改之后，1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两年半之内没有了，有资本外逃、人民币贬值、民间投资增速断崖式下跌等等问题。上海几次要搞 QDII2，几次到边上又收回来了，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试验步子卖得不大。现实中存在一些经常项目漏洞，确实存在各式各样的虚假贸易、贸易融资套利等风险。2017 年 1 月国发 5 号文，扩大利用外资，里面也提到金融要探索开放，但是整个上半年进展不大。当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什么呢？是金融风险防范。这个中间，不管是美国还是欧盟商会的报告，不断施加压力。中间谈来谈去，包括海湖庄园会谈等，百日计划稍微喘了一口气之后，美国并不满意，很快压力又上来了。到六七月份，中央已经看到这个开放的紧迫性，也看到各个地方反映上来的有关国发五号

文落实不到位的问题。7月17日的时候，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讲话，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面。要合理安排开放顺序，对有利于保护消费者权益、有利于增强金融有序竞争、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的领域要加快推进。要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稳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他也降到，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金融监管能力必须跟得上，在加强监管中不断提高开放水平。这个讲话之后，7月底国务院常务会议起草了国发39号文，还是关于利用外资的，在8月份下发，一年之内对外资发两个文，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以前都是几年发一个文，这次一年发两个文。这个文和以前完全不同的一点是，不仅要开放，而且各个部委立刻要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大家看到时间表和路线图这些词，是在去年8月的时候开始用的。但是8月份已经有点来不及了，8月份美国301调查启动了。不管怎么说，在推动中国开放的问题上，我们已经往前迈进了很大的一步。国发39号文列出了很多重要行业，包括对整个金融业宽口径定义、银行证券保险，都要定时间表开放。2018年6月28号和30号发布的两个负面清单，非常明确地表示三年之内金融大开放，所有的股权限制全部取消，实际上业务限制也取消。这次的开放不像入世议定书中的那个金融的开放，有这个限制、那个限制，这次是自主开放，而且自主开放的幅度远远大于2001年的开放。包括汽车全面开放，现在说2022年之前全面开放，我估计甚至有可能还要提前。

所以如果特朗普回去以后吹牛，说我厉害吧，我把中国金融全打开了，把中国的汽车行业全打开了，电信行业已经打开一半了，他这个牛是能吹的。但是我们和美方的学者、

企业界人士谈的时候，他们没有几个人满意，没有几个人认为这就够了。为什么？目前的情况和以前不一样了，他觉得现在就我算进来，我也干不过你了。这次汽车业开放有反对意见。金融业开放业界人士没什么反对意见，开吧，我们不怕竞争大家都是这么一个态度。再加上我们有些行业，有像华为这样的企业，中车这样的企业。美方认为，不光是开放的问题，我现在没有机会了，你国内的竞争者已经很强了，而且国内监管还不够公平。所以这次它要求的東西更多是结构性的问题。美方的主要担忧，如果你看 301 调查，四项指控，全部都和技术有关，全部都指向你背后有政府主导。301 的四项指控基本上都是世贸组织不管辖的领域。从 301 调查本身来看，这次争端是技术优势之争，是全球价值链的主导权之争，是经济发展的模式之争，还有最后一个，是全球经济治理的话语权之争。对我们的国家主导经济的批评，不但是美国，欧洲、日本提出的联合声明都在不断谈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美欧日是完全一致的，但细节有差别，这个不多解释。有些发达国家，比如挪威，在国有经济的某些问题上，在世贸组织中，甚至和中国的立场更接近。因为它也有一些国有企业。但是大部分发达国家都担心这个问题。现在在全球 500 强里有 115 家是中国企业，大部分是国企，前四强有三家是中国国企，甚至 18 家地方国企都能进全球 500 强。有人预测，在未来的 20 年之内，应该有 200 家中国企业进入全球 500 强，中国的国企将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重要演员。

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的警惕之心是没有办法隐藏的。但是有一点我们要看到，它到现在也没有直接说你不许搞国企。美国自己也有 20 多个央企。它要求要有一定的规则，

来规范国家主导经济。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它不但在中美谈判中，而且提出了在世贸组织的改革中，要建立共同的规则，对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进行一定的约束。美国对世贸组织提出了众多的批评，但是不像加拿大和欧盟，美国自己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方案，但是从它各种表述中间，我们看出它有四个倾向。第一个倾向，它可能希望部分放弃最惠国待遇的基本原则。不光是中国，欧盟还有其他的成员，对此都有反对意见。美国智库中有这样一些说法，很多智库也不是要彻底放弃最惠国待遇，是要部分放弃最惠国待遇，就是说要给美国留下双边处理问题的空间，即可以在某些时候或某些领域不适用最惠国待遇，不需要一视同仁，可以对这个国家待遇好点，对那个国家待遇差点，给它留出空间，这是很多讲话中流露出来的意思。第二个倾向，是希望原则上取消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差别待遇，或者仅仅把这个待遇给予最不发达国家。第三个倾向，即使中国以竞争中立的原则搞国内监管，它可能也不满足。即使中国接受了OECD的竞争中立原则，美国很多的智库人士认为，还是没有办法约束中国。他们认为OECD的竞争中立原则是针对OECD发达国家，它们国有经济比重一般不大，竞争中立原则保证国企和私营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他们认为对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主导型的经济，这个不够，必须搞其他措施，比如非商业援助等规范，对中国进行更多的限制。也就是说，它要背离世贸组织、甚至在原来欧盟的条约中都规定过的所有制中立传统。所有制中立和竞争中立不同，两个其实是互补的。竞争中立是说不能给国企更多的优惠，所有制中立是说不能专门歧视国企。第四个倾向，可能是希望弱化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强制性，可以把一些重要的敏感的

问题排除出裁决机制，以给它进行政治谈判解决留出空间，还有就是弱化上诉机构。这可能是美国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不知道，但是它会影响世贸组织的走向。

另外，欧盟和加拿大都提出了相关的提案，这些方案既包括实体贸易规则的改革，也包括世贸组织日常运作机制和透明度，还包括争端解决机制的问题。在争端解决机制上，它们和中国还是比较一致的。比如说这次 12 月 12 号在 WTO 总理事会上提出来的提案，加拿大、欧盟，印度等，以欧盟的版本为主，都在上面签字了。日本比较圆滑，他们学者来跟我们交流的时候，说不会在上面签字，说知道美国肯定不会通过的，对不会通过的事情他们就不签字了。日本首要想打的是补贴透明度，把世贸组织里的补贴透明度增强，然后打市场准入，在这两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其他国家的意见分歧非常大。甚至在这次 G20 领导人声明的第 27 段，领导人谈到这个问题的表述时，还是有很多交锋。南非在最后的时间，甚至讲这次不要用“改革”，说世贸组织挺好的，你要改革就说明觉得它不太好，最好用改进。各国的意见分歧是非常大的，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要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一方面，美欧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确实有共同立场，甚至对中国形成一定的压力，这个要高度重视。但是不同国家的诉求有很大的差别，特别是在这次的贸易战中，其中一个战场是美国专门打中国的贸易战，另外一个战场是美国对世界打的，包括 201 条款、232 条款，特别是 232 贸易战，一个打钢铝，一个是汽车，它指向的目标是制造业回归。美国的制造业回归，不是鞋子袜子的回归，是飞机、船舶、汽车、钢铁、军工的回归。实际上它的飞

机根本就没有走，军用船舶也没有走。它的议会搞了一些办法，想把民用船舶加强起来。这次正在重点打的是钢铁和汽车。汽车还没有宣布措施，也有可能最后不搞措施了，钢铁是 25% 的关税，铝是 15% 的关税，这个已经搞了。这个对谁影响大？对中国有影响，但不大，真正影响大的，特别是对日本的汽车，日本极为紧张。日本是美国的第一大汽车出口国，它们之间属于水平型竞争。美国制造业的回归，对欧日的影响，甚至会高于对中国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日实际上都做了很多的小动作。虽然我们很难和欧洲、日本达成统一战线什么的。但是在争端解决机制、232 条款这两个问题上，实际上欧日的立场是和中国是更加接近的，在这个方面是有配合的。

我们多边谈判、区域谈判的各种形势，本身是相当复杂的。谈判之前，我们提出了不到 4 页纸的三项原则和五点主张。这三项原则、五点主张在研究世贸组织的学者中有很多议论。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些主张中间是留下了灵活度的。比如我们讲协商一致的时候，特别是王毅的表述，他说的是协商一致的精神，这并不表示我们一定要坚持所有的事情必须所有成员都要通过，真要所有成员都通过的话，美国一个不通过，所有的事情就都通过不了。我们谈协商一致的精神，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还是要大家说了算，吸取更多人的意见。在世贸组织中，在有的时候、有的方面，讲这个协商一致，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利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地位，又有点发达国家的性质，又有点发展中国家的性质，在这个中间获取最多的谈判的地位。协商一致并不表示真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成员都参加，中国也主动地发起了投资便利化的谈判，这个将是诸边谈判，不是所有世贸成员都参加的。

在这个谈判过程中，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表示反对，情况很复杂。这个谈判不需要所有的成员都来参加，这种谈判，即诸边谈判，它为解决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的异质性差异性留下了空间。开放诸边的谈判方式，并不必然和协调一致的精神相背离，也不违反最惠国待遇的原则。

我们讲发展主题，有人讲太落后了，中国应该加入 OECD，还搞什么发展主题？邓小平 80 年代判断，和平与发展是主旋律，现在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但在这个问题上的判断仍然还有意义。这次 G20 的主题是什么？就是发展主题，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几个重要议题都是发展主题，包括对基础设施的融资等。所以发展主题是没有过时的。说到这里，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很多地方中国是作出了让步或者妥协的，包括在 G20 上对基础设施的融资透明度的声明，中国是同意的。这些是我们对外界一些批评和压力的一种回应。G20 的领导宣言中也提到国有企业，我们也认可了。所以我们说让步的空间实际上是足够的。但是现在有一个三项原则、五点主张放在那里，首先给自己挖一个战壕，包括说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马上后面跟一句话，随着中国的发展程度，我们要承担和我们的能力相适应的更多义务。具体谈判发展中国家待遇时，人家对我们是有很多压力的。但是真正具体的权利义务，是谈判谈出来的。我们强调发展主题，并不是说现在一定要和美国硬顶，是有很多谈判的灵活空间的。

关于世贸组织谈判的前景，我们对争端解决机制在短期内达成一致不抱乐观态度，美国在这个地方不会让步。所以我很担心，明年上诉机构可能出现停摆，多边贸易体制可能出现动荡调整期。全球化的发展，1995 年世贸组织成立是

很大的跃进。但是客观上说，我觉得当时把各个国家绑得有点太紧了，今后甚至不排除争端解决的约束性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在世贸组织谈判三个领域中，不同的领域对我们的压力是不一样的。争端解决机制紧一点或松一点，对我们来说有多大影响？其实这个事情，紧一点有紧一点的好处，松一点有松一点的好处。我们现在全按照欧盟的方案，跟它统一立场，因为中欧之间有一个协调机制，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有一定的战略考量。最后到底能谈成什么样的结果，这个是可以灵活的。明年在东京开 G20 峰会，基本上会总结一下到底哪些议题可以谈，下一次世贸组织会议要到 2020 年 5 月份在哈萨克，如果说有些谈判必须要部长级会议授权的话，这个谈判真正完成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世贸组织像以前那样达成一揽子协议，我觉得可能不一定会这样，可能有更多的开放诸边协议，满足不同国家的异质性要求，而且现在各国竞争性的区域经济合作增多。现在我们在猛推 RCEP 谈判和中日韩谈判。明年 5 月份是印度大选，在这个之前印度不会做什么让步。但是过了 5 月份，印度在亚太地区想要更大的活动空间，如果中日这边能够好好再让一让，尤其是中国实际上可以多让一点，解决它对中国很重的担心，与印度的谈判有可能取得比较好的进展。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些国际上的谈判和中国国内改革的问题。世贸组织的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就算没有谈出结果来，但是客观上对中国国内的开放改革也会有推动。我们如果在国内的竞争中立做得更好，就更有理由在国际上不让人家对中国进行歧视。竞争中立讲一视同仁，但是它应该有具体的规范。OECD 在 2012 年提出了八个具体方面，包括企业经营的形式、成本确认等各个领域，实际上已

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竞争政策的范畴，涉及企业竞争的方方面面。如果能够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有国内的具体规范真正落实的话，那么对中国的国企改革和整个改革的往前推动，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影响。在推动竞争中立的同时，在世贸组织中，在国际谈判中，我们就可以讲要维护世贸组织的所有制中立，不要对国企搞单独的限制，包括像 TPP 和美墨加协议中那些对国企的单独限制。

实际上这个问题在世贸组织中是一直有争议的，因为在世贸组织中有一个公共机构的问题。中国的国企，最典型的是中国的银行，银行在给企业放贷的时候，如果这个利息低了，可不可以算是对企业的补贴？因为补贴是政府给的，现在国有企业作为一个补贴发放的主体，中国的国有企业国有银行能不能算公共机构？或者中国的电力公司，中国的铁路公司，算不算公共机构？如果这个都算的话，那麻烦了，中国很多的货物都可以给你算出补贴来，都可以很容易对你反补贴。在这个问题上，世贸组织中有很多国家和中国是一个立场，有很多国家和美国是一个立场，欧洲和日本介于中间。美国赞成政府控制说，意思是只要是国有企业，有政府的所有权或者控制权，就算你是公共机构。世贸组织最后没有接受这个看法。世贸组织的裁决是讲政府权力说或政府职能说，你必须履行政府职能，才算是公共机构。在这一点上，世贸组织的判决对中国是有利的。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中，它判断你是不是履行了政府职能，判断你是不是行使了政府责任，举证责任的界定是非常松的。这里面就出现一个问题，比如我们的商业银行法和我们的各个商业银行，在章程里只要提了要执行国家政策什么的，就被认为是履行了政府职能，就算是公共机构。银行给其他的企业贷款，

可能就包含了补贴。这对我们在外面被反补贴的压力就会更大。现在世贸组织在这个问题上，还不够明确。原则上来说，它的判决更偏向中国这边一点。美国在谈判中就要求，不管裁决了，我们要搞一个规则，这个规则的结果就是说，你的国有企业就是公共机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是坚决要跟它顶的。在这些事情上，还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多边规则在这方面的问题上，也还存在不确定性。

总体来说，竞争中立原则的落实有助于降低国际上对国企的歧视性，有利于提高中国市场的效率公平。说老实话，这方面不仅外企有意见，我们的民企可能意见更大。如果真正能够做到完全落实竞争中立，对中国市场效率的提高和长期公平竞争的保证，可能是好事。我这里提一个稍微有点敏感的话题，我有时候讲，在中国有一个改革开放不可能三角，是讲三个问题不可能同时兼顾。第一个问题，准入开放，我们叫全面开放，包括我们现在负面清单不断压缩。我们中央文件，我们下面要打造全面开放新格局，很多行业负面清单越来越短。中欧之间有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美之间的谈判前景目前还不知道，这个过程往前推进，我们的负面清单会越来越短，很多领域将完全开放，这是三角中的一个角。第二个问题，公平竞争，全面落实竞争中立原则，我相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后，慢慢会出来一些东西，逐渐落实竞争中立。第三个问题，就是 2006 年国资委文件以及后面一系列文件中谈到的问题，对国民经济命脉和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要实行国有经济绝对控制，在另外一些基础性支柱行业要实现国有较强控制。当时国资委提这些东西的时候，是讲七大行业实行绝对控制，实际上，铁路、邮政、金融等，实际上那些也都是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但

所有的这些行业，也都是目前国外要求你压缩负面清单的，一个一个压缩那些重点行业，包括铁路、金融。这些行业在负面清单上一个一个被剥离出去，一个一个承诺全面开放，同时要落实竞争中立，落实审慎监管的公平对待。如果前两条真正落实，你又如何长期保证绝对控制和较强控制？这个影响肯定是会有的。我相信，可能需要对国资改革、战略发展的思路，要有一些基本的理论创新。

最后我们谈一点，就是中美经贸关系长期发展的趋势。从长期来讲，中美经贸会趋向横向化趋势，会由原来基本上是互补型、垂直型的分工，越来越多地出现水平型国际分工。不过即使十多年以后，中国和美国 GDP 一样的时候，我们的人均 GDP 水平也只是它的四分之一。横向分工的比例会越来越大，长期还是纵横交错的格局。横向的过程就是竞争性行业重叠的程度越来越大，产业的摩擦越来越多，这是一方面。但是，我们要看到另一方面，就是中美之间，随着中国的产业升级，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的合作空间扩大了。在有些全球经济治理的重大问题上，比如投资自由化的立场、投资便利化的立场、环境保护标准的立场、知识产权保护等的立场等等上，随着中国产业升级的过程，双方的谈判空间扩大，立场开始逐渐接近。在这样的情况下，中美之间就需要利用这种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合作空间，来抑制这种模式之争和产业内不断加剧的竞争。中美之间，虽然我可能也不一定非常喜欢你，你也不一定非常喜欢我，但是不得不坐下来，好好地一起来谈规则。尽管这个谈判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目前来讲，妥善解决这个争议，特朗普的获益面是比较大的。如果这个事情继续打下去，中国压力非常大，11 月份外贸、外资的数字已经非常难看了。美国的压力也不小，

虽然它有资本流入，但是真正的直接投资数字也已经变得不好看了。如果一直打下去，特朗普景气周期可能提前结束，对他继续竞选很不利。双方有共同利益，有坐下来休战的动力。但是美国国内的情况是很复杂的。美国前一段时间有交易派和结构派的分歧，交易派觉得要让中国买买买，让中国首先解决顺差逆差问题；结构派是一定要把中国的发展模式扭过来。这一段时间呢，已经不光是交易派和结构派的分歧了，是经贸派和安全派的分歧。有一帮人要解决经贸问题，但是有一批人要解决长期的安全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排除即使是特朗普想把这个谈判谈下来，后面也不断有人给他捣乱。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一定要沉住气，不能碰到问题的时候太激动。90 天的谈判面临着美国各方面力量的干扰，但是现在看来，仍有比较大的希望达成一致。在这个初步达成一致之后，未来的数年之内，会继续进行谈判。这个谈判，包括世贸组织改革的谈判，我认为是一个世纪性的制度谈判。不同的发展模式之间，有那么大的分歧，如果能够在这样大的矛盾下坐下来谈，不管是怎么艰难，都是一件好事。甚至把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我们这个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和它市场竞争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在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中磨来磨去，最后谈出一个结果来，这个可以说是一件挺伟大的事情。但是可想而知，这样的谈判是何等的艰巨。

所以，我们要做好各式各样的思想准备。但是我相信，中国的经济虽然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能够克服这些困难，最后仍旧能够健康发展，谢谢大家！

乔依德：我想大家也会同意，崔教授做了非常精采的演讲，专业性强，条理也很清楚，对我们大家理解当前的中美经贸关系以及 WTO 改革问题有很大的帮助。我补充两点，

崔教授刚才讲的过程中提到协商一致的原则，他讲还是留有余地的。10 月份在印尼巴厘岛开世界银行年会，我去参加了，有一场会是专门讨论贸易问题的，会上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是主持人，桌子上坐中国、印度、韩国以及其他几个国家的代表。最后他提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主要就是对中国和印度说：你们坚持协商一致，美国坚持不同意，如果你们坚持，可能美国就要退出 WTO，你们自己衡量一下看，你们愿意美国退出呢，还是你们愿意放弃协商一致？我记得当时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是这样讲的：我们可以同意重大问题上要协商一致，其他问题上可以多数统一。这其实也透露了我们是有点妥协的。还有一点，我记得世界银行年会上有一个裁决，认为国有银行是国家机关，一般国有企业不算，因为国有银行有权力决定贷款。我想大概中国还能接受这个。我就补充两点。大家请提问。

尉安宁：中美经贸谈判有这么一个承诺，就是中国答应买美国的产品。如果说买美国产品的是中国的企业，企业基于市场经济原则，不一定要买，因为太贵了。但是政府承诺要进口这么多的东西以消除贸易赤字，这和美国倡导的市场经济原则有冲突，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崔凡：我刚才说，美国有交易派和结构派之间的争议。美国有很多诉求来自不同的利益集团，互相之间是有矛盾的。比如关于中国投资开放的问题，有些人讲中国的投资开放很重要，但是也有些人讲我们不关心投资开放的问题，因为我根本不想让投资到你这里来。所以美国的很多主张确实是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关于买大豆，有外媒讲，目前要买的可能有 500 万吨，现在已经有 150 万吨下单了，这次可能是政府采购，采购的

大豆直接入储备。这次出乎我们很多人的预料，原来我们担心不买美国大豆的话，咱们会有通货膨胀，价格上涨。结果你看这两个月的豆制品，包括大豆期货价格，美国低迷，中国也低迷，价格没有上去。巴西的大豆是大丰收。而中国降低了豆粕饲料蛋白配比，一下子又省出来很多吨。按照目前行情，实际上如果单从商业考虑来说，也许并不划算。中国现在买大豆，作为买方这边的压力，甚至比作为卖方美方还要低一点。美国的大豆已经堆在那里存不下了，所以要赶紧卖，否则影响下一季种植的面积。所以这次是一部分用政府采购的形式，避免了市场的问题。确实有很多人提出你的问题，可能中方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也会这么说。但是中国在可以做的范围内，在政府采购的范围内，做了一个姿态，达成了这个善意的举动。

尉安宁：这个矛盾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吧？比如现在 5 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以后减到 2 千亿，但我不能老是采用政府采购的方式啊。

崔凡：这个贸易不平衡问题可能有几个方面来解决。一是通过降关税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再有一个，就涉及到价值链重整的问题，本来中国还没有到那个进行大规模产业转移的关口。但是现在等于把这个事情提前往前推了。有一部分终端的最终产品的生产转出去。不过这次的大转移，我们必须要保证有一部分不转出去，向内地转，要保就业。低端的一些制造环节，可能要挪出去一部分，但挪不到美国去。我前两天也在会上讲，这个挪，会有助于中美之间双边贸易差异的解决，但无助于美国全面贸易逆差的解决。美国最终要解决全面贸易逆差，关键还是自己的宏观经济政策，那是最根本的。

乔依德：时间不早了，我们只能到此告一段落。最后，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崔教授表示感谢，也感谢大家的参加，谢谢大家！